

文化适应视角下移居者的社会心理适应：

多元模型述评与中国经验初探^①

金 毅

摘要：在美国学界有关移民/移居者议题的研究中，同化理论长期以来居于主流。但就对现实状况变化的因应而言，文化适应理论提出了包括同化在内的四种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更为灵活适用。本文尝试将“分段同化”、“叠合认同”和“文化动态建构”等相关理论模型，整合到文化适应理论框架下，并将这一视角移置到有关国内移居者的研究中来，从而呼应转型心理学的理论诉求，在有关中国经验的研究实践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适应 同化 移居者 移民 适应

一、导言

一个多世纪以来，技术革新的潮流不断从根本上挑战时间与空间的传统意义，“时空压缩”改变了人们体验时间和空间的主导方式（哈维，2004：1，329）。全球化既是技术革新和“时空压缩”进程的后续效应，又进而成为了驱动社会版图的面貌发生深刻变革的关键力量。与空前流动的信息和资本一样，大规模的人群越过民族国家的边界，到异国定居、求学、短期工作或者旅行，来自联合国的数据显示，2004年全球有17.5亿人离开了他们出生的国家生活（Oudenhoven，2006）。国际迁移者与迁入国主流社群间的文化差异，势必对发生接触的双方造成不同层次的社会心理后果，并且影响到迁入国文化本身。从个体层面而言，例如大石和基斯灵（Oishi & Kisling，2009）以社会生态视角，通过大量经验研究发现，较高度度的居住流动性与个体主义倾向是相互建构的，频繁的迁移和流动会改变个体组织自我概念及归因的模式，降低源于社会互动的快感和采取亲社区行为的可能性。而就群体或国别文化层面而言，面对大规模人群势不可挡的国际流动，不同的主流社群会采取不同的因应策略，进而将自身型塑为“文化熔炉”或者“文化多元主义”（Berry，2006）。另外，如果考虑民族国家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异，将划界的标准下延到民族国家内部，进而讨论人群国内流动的社会心理影响，则涉及的人群规模将更为庞大，作用机制也将更趋多样化。

本文将选取“文化适应”概念作为对相关理论模型进行尝试性整合的基础，以期为理解迁移活动给移居者和迁入地主流文化群体等带来的社会心理影响提供更为有效的理论工具。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没有选取常用的“移民”（immigrant）这一术语，而是将范围更广的“移居者”（migrant people）作为讨论的目标人群。居处在同一多元社会中的人群，通常可以依据三个维度分为六类（见表1；Berry，2006：30）：（1）接触的自愿性，即个体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混居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如此；（2）居住的流动性，即这些人群是世居于此，或是由他地移居而来；（3）对于移居人群而言，还有时间维度，即他们定居于此，抑或只是临时居民。通常所说的移民，也是移民研究关注的重点，主要指自愿移往某地并永久居住的人群。不可否认，移民现象对于迁入地和原籍地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对于一些移民国家，这类人群构成了全国或国内某些地区居民的大部分甚或绝大部分。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暂时性移居者群体，即旅居者给流入地带来的影响及他

^① 感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方文教授和李康副教授为本文写作提供的帮助和提出的修改意见；本文曾于2012年6月在中山大学举办的“移民与族群关系国际研讨会”上宣读，感谢周敏教授对本文所作的评论及提出的修改意见。

们的社会心理适应过程。旅居者主要包括商业人士、留学生、专业技术人员、传教士、外交官、旅行者等(陈慧等, 2003), 我们通常所说的“流动人口”, 即是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一类旅居者群体; 与此同时, 移居者对于在迁入地居住时长的预期, 可能也会受到外界因素影响而逐渐发生变化, 一些旅居者可能会永久性地留在迁入地, 最终成为移民, 他们与当地人的互动策略亦势必发生变化。例如周敏(1995: 23, 36-59)在有关美国唐人街的著名研究中便注意到, 早期前往美国的中国人只是将赴美工作视为发财的捷径, 始终怀着衣锦还乡的梦想, 认为自己只是暂时留美, 使得华人社区相对隔离; 而随着自身处境、国际国内形势等因素的变化, 他们及后续怀着类似目的赴美的中国人中, 有相当一部分无法回国, 他们的生活形态、对待美国主流文化的态度, 也将相应改变。正是基于上述两点, 才有必要将移民研究的对象扩展为“移居者”。

表 1 多元社会中的人群类型

流动性		接触的自愿性	
		自愿的	非自愿的
定居		民族文化(ethnocultural)群体	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s)
移居	永久性	移民(immigrants)	难民(refugees)
	暂时性	旅居者(sojourner)	寻求庇护者(asylum seekers)

二、同化理论及其修正和扩展

在美国学界有关移居者群体(主要是移民)丰富的研究文献中, 同化的概念虽然招致了不少批评(Alba & Nee, 1997), 但在很长时间内占据了主流地位(周敏, 1995: 18; Zhou, 1997b)。同时不断有研究者为了回应对同化概念的各种批评, 以及应对移民现象的最新趋势, 而努力对传统同化理论进行辩护、扩展和修正(Alba & Nee, 1997; Waters & Jiménez, 2005), 使其得以保持解释力。

用同化概念来研究移民, 通常可以溯源到以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和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等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经典研究(Gordon, 1964: 62; Alba & Nee, 1997; Zhou, 1997b)。对同化理论提出批判的研究者, 也主要针对由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者们提出的同化的相关特征。在帕克和伯吉斯看来, 所谓同化, 是指“一种相互渗透的融合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个体及群体通过与他人或其他群体共享经历和历史, 逐步获得他人或其他群体的记忆、情感和态度, 从而将自己并入他人的文化生活之中”, 尽管这一进程的速度会因社会接触的类型而有所差异, 但仍然是由接触引起的社会互动最终的最佳产物(Park & Burgess, 1921; 转引自 Gordon, 1964: 62)。同化会具体表现为, 无论移民的种族和文化背景如何, 都能与当地居民“占据同一块领土、达成某种至少能保证民族存续的文化团结”(Park, 1930; 转引自 Gordon, 1964: 63), 同时进入经济主流, 在教育 and 职业方面取得令社会认可的成就(周敏, 1995: 18; Zhou, 1997b), 或许要经历数代人, 才能最终完成这一进程。

戈登在其著名的《美国生活中的同化》(Gordon, 1964)一书中, 列举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大批理论家给出的同化定义, 大多与帕克和伯吉斯提出的概念没有根本性歧异。应当承认, 他们的观点是契合当时美国社会状况的。不过就美国历史而言, 同化并非一成不变, 戈登(Gordon, 1964: 85)认为, 可以循三条轴线对美国语境下的同化经验进行归类, 即: (1) 盎格鲁化(Anglo-Conformity), 这主要对应美国历史早期特别是独立战争前后的状况, 当时的移民以英裔新教徒为主, 因而美国文化的主流希望能维持经过独立战争调整过的英国制度、英语及英式文化模式在美国生活中的统治地位, 将英国生活作为新大陆文化的范本(Gordon, 1964: 88); (2) 熔炉(melting pot)模式, 主要涵盖美国自18世纪以降的社会状况, 大量非英裔欧洲移民迁入, 将本国文化的某些要素、尤其是宗教因素混入一种新的主流文化之中(Gordon, 1964: 85, 115), 不过即便主流文化发生变化, 它仍将作为一种具有支配地位的文化形态存在, 兼具不同特征的少数群体将处于社会边缘, 并且按照通常假

定他们的文化将无以延续,最终还是会被吸纳进主流之中(Berry, 2006: 27-28);(3)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主要指更后期的移民群体得以在美国公民社会语境中保存其公共生活及相当一部分的原有文化,并且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整合到美国社会之中(Gordon, 1964: 85),不过在戈登看来,文化多元主义会在社会中形成诸多彼此分异但同构的亚群体,而更为契合美国实际状况的表述应该是“结构多元主义”(structural pluralism; Gordon, 1964: 158-159)。但无论哪条线索都是同化目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化这一中心趋势则并未改变(Gordon, 1964: 85-86)。

戈登的分类尝试是基于20世纪中期以前的美国经验,没有涉及此后半个世纪、特别是1965年新移民法案颁布后的状况,但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我们对移民适应美国社会机制的理解,他建构的模型也在族群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Alba & Nee, 1997)。不过也有研究者对戈登的分类系谱提出了质疑,如阿尔巴和倪志伟(Alba & Nee, 1997)便提出,不应将“文化多元主义”归入“同化”范畴。不过同化理论后继研究者们仍然坚持,可以找到经验证据来支持同化理论的当代适用性(Waters & Jiménez, 2005),同化理论还具有强劲生命力(参见Olneck, 2006: 21),并且研究者们也因应时空语境的变化进行了许多扩展和修正努力。

鲁博特(Rumbaut, 1997)在其综述性研究中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同化,包括:(1)社会经济同化,主要指“在教育、就业、收入等指标上获得与主流群体同等的地位”;(2)文化同化,又称“文化适应”,是指移民从不了解美国文化到获得从语言及至思考模式上的同化这一进程;(3)语言同化,即移民的英语学习过程,不过因为英语的世界语言地位,对许多移民在迁移之前已经基本完成了这类同化;(4)政治同化,即移民入籍并投身美国的选举活动的进程,他们的政治态度已经足以形成一些规模性的政治效应。

作为同化理论的拥趸,阿尔巴和倪志伟(Alba & Nee, 1997)虽然对戈登的“经典”同化论提出了质疑,也承认在“过去”和“当下”两个移民时代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差异,诸如移民潮流中可预见的断裂不再存在、新移民群体更多元化的种族特征及经济重构对移民机遇的影响,但仍然可以从移民的社会经济成就和空间模式等方面,发现同化理论适用的现实证据。

与之类似,沃特斯和希门尼斯(Waters & Jiménez, 2005)承认同化理论在现实运用中遇到了一些障碍。不过他们认为这一现象主要由两大因素造成:首先,移民不再像早期一样只聚集在纽约、洛杉矶等少数大都市之中,他们开始向以往并未接纳移民的州以及乡村地区扩散,这些区域的人群与移民的互动尚需一段磨合期;其次,由于美国移民法案作出了一些调整,使得新移民能够源源不断涌入美国,进入同化进程的移民,可能与刚刚抵达、尚未开始同化进程的移民有着多重连带,因此更为亲和,从而阻滞了他们的同化进程。换言之,在沃特斯和希门尼斯看来,不能急于下同化理论已经失灵的断言,而应留出更长的时间以备检验。

奥尔内克(Olneck, 2006)在为《美国移民指南》撰写的有关同化的章节中提出,“同化”与美国的国家认同是相互关联的,例如在所谓同化的“熔炉”模式中,“美国”及美国主流文化的含义都可能因移民而发生改变,同化的意涵也会随着“美国”的政治意义及公民对美国国家认同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从而赋予同化以更大的理论弹性和包容力。

所以,同化理论在历代理论家的努力下得以不断修正和发展,以因应移民状况的变化。但其理论的核心旨趣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所以还多少隐含着某种种族中心主义的原罪;同时,对同化理论的不断扩展也使得“同化”一词的能指无法囊括理论家们的所有雄心。正如周敏提出的问题所针对的那样,既然这批理论家们言必称同化,那么移民究竟要“同化成什么”(Zhou, 1997b)?如果“求同”的动因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学术承传,那么要更好解析现实问题,就有必要重新选择更灵活适用的概念框架。

三、文化适应理论的研究框架

戈登除了循三条轴线对同化经验进行归类外,还建立起了一套有关阶段的类型模式(Gordon,

1964: 71), 包括: (1) 文化或行为同化, 即移民的文化模式朝主流社会方向变化, 亦称“文化适应”; (2) 结构同化, 即在初级群体层面, 移民大规模进入主流社会的小圈子、俱乐部和其他协会; (3) 婚姻同化, 通过移民与主流社群间的大规模通婚实现, 亦称“混合”(amalgamation); (4) 认同同化, 即移民发展出唯一一种基于主流社会的民族意识; (5) 态度接纳同化, 即主流社会对移民的偏见逐渐消失; (6) 行为接纳同化, 即主流社会对移民的歧视逐渐消失; (7) 公民同化, 即移民和主流社群间基于价值和权力的冲突逐渐消失。戈登的这一阶段模式影响很大, 被普遍认为展现了同化进程的非线性特征(Rumbaut, 1997)和多样性(Zhou, 1997b)。文化适应被视为同化的一个阶段, 或者是移民研究的同化理论者们研究策略的代名词(Gans, 1997)。而与同化理论所持的“求同”旨趣相对, 多元主义的主张者们则倾向于“存异”。甘斯(Gans, 1997)认为, 两派学者围绕文化适应和族群持存(ethnic retention)的观点裂解成两个针锋相对的对立阵营, 他希望两派研究者能了解彼此歧异, 采取反身性研究策略, 从而达成和解。尽管甘斯并没有提出切实有效的和解途径, 但他仍敏锐地指出了“同化”与“文化适应”之间的区别(Gans, 1997), 而和解的某种可能性, 或许正存在于对“文化适应”概念的重新理解中。文化适应概念首先是由文化人类学家引入学术研究界的。迄今为止使用最广泛的定义, 是雷德菲尔德(Redfield)、林顿(Linton)和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1936年在发表于《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Berry et al., 2011: 308), 他们认为, 文化适应是指“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发生持续的直接接触时, 给某一方或双方的文化模式带来的持续变化……根据这一定义, 文化适应的含义不同于文化变迁和同化等概念, 文化变迁是文化适应的一个方面, 而同化则是文化适应的一个阶段”。所以文化适应并不只是指向文化接触后果的同化之维^①。事实上, 无论是民族志观察的记录, 还是同化视角对同化后果的定义模糊, 都使得援用多维视角来取代同化理论或者熔炉模式成为必需。文化适应研究则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界的热门议题, 并且在诸如跨文化心理学等领域占据核心地位(Berry, 2001), 许多学者对文化适应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他们提出的理论模型可以范畴化为单维度、双维度、多维度、融合模型等几种类型(余伟、郑钢, 2005), 其间最有影响的理论家则是加拿大皇后大学心理学系的荣休教授贝里(John Berry)。

依循雷德菲尔德等人对文化适应的定义, 贝里提出了理解文化适应的一般性框架(Berry, 2005; Berry et al, 2011: 312): 就群体层面而言, 当两种文化发生接触时, 会分别对双方造成文化转变; 而就个体心理层面而言, 两种文化中的个体都将面临心理层面的文化适应, 具体表现为行为转变和文化适应压力, 进而将会在心理层面和社会文化层面达致适应。而其模型最为关键之处, 则是影响个体行为转变的方式, 并分别给他们带来压力的文化适应策略(Berry, 1990; 亦见于 Berry, 1997, 2001, 2005, 2006, 2008, 2009,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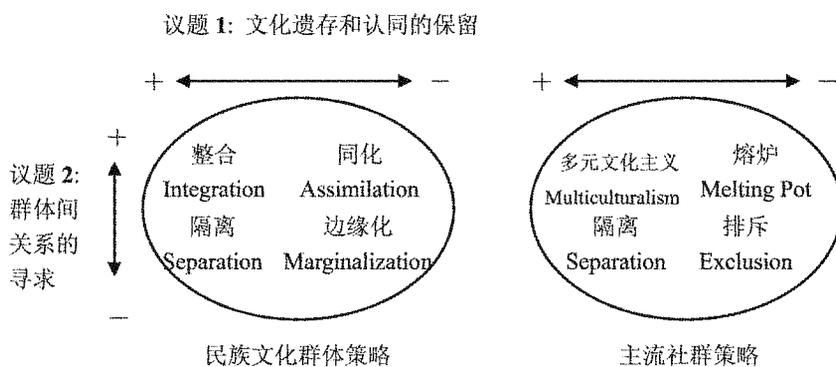


图 1 移居者及主流社群的文化适应策略(Berry, 1997; 2001)

^① 戈登在其研究中, 实际上也引述了雷德菲尔德等人的上述定义。只是戈登舍弃了“持续变化”之后的一段内容(参见 Gordon, 1964: 61)。

既然文化适应被定义为一种推动文化模式变迁的双向度进程,会同时影响移居者群体和主流社会群体,贝里在讨论文化适应策略时(Berry, 1997),便分别着眼于两个受影响群体提出两类议题:(1)文化维持,即“在何种程度上,原有的文化认同与特质仍会被认为相当重要并应勉力维持”;(2)接触和参与,即“不同人群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和其他文化群体的互动中,还是仍保持其原有边界”。以对这两个问题的肯定或否定回答为简化后取值,贝里分别对移居者群体和主流社群建立了一个2×2列联表来展示四种类型的涵化策略(见图1)。

根据图1的分类模式,贝里(Berry, 1997)认为,作为在迁入社会中不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只有在移居者不再维持原有的文化认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寻求与主流社群中的其他成员互动时,他们才会选择同化策略,因此同化理论的视角可能造成经验事实流失相当大的一部分;与此相反,如果移居者仍然认为保持原有文化有其价值,并且避免与其他群体互动,这种类型的文化适应策略则可以被界定为隔离,周敏(1995)在她对纽约唐人街的经典研究中展示的华人在北美社会的生活状态,就可以作为隔离类型的范本;如果移居者并不放弃原有文化,但又与主流社会的其他群体保持日常接触,那么对他们而言的选项则是整合;最后,如果个体难以维持或没有兴趣维持其原有文化,同样也没有与主流社群建立联系的兴趣,那么他们只能面临边缘化的处境。

自贝里(Berry, 1990)提出上述文化适应策略的分类模式以来,不断有研究者对四种类型是否存在经验证据等提出质疑,贝里(Berry, 2005, 2009)也与其他研究者一道进行了大样本调查,找到了充足的经验证据。因而这一分类模式几乎出现在他近年来关于文化适应议题的每一篇论文中,未作大幅改动。不过需要注意,仅就移居者来讨论其文化适应策略,是从移居者有充分的自由能依照自身的意愿选择文化适应类型为前提出发的(Berry, 1997)。事实上,文化适应会对移居者群体和主流社群双方都产生影响,并且通常情况下,移居者的意愿及特定的文化适应策略,都必须得到居于主导地位主流社群的响应(如图2右部所示):即便移居者选择了同化策略,也只有主流社会对于群际交流采取相对积极的态度,寻求与移居者建立稳定的联系,同化进程才能真正开始;如果主流社群对与移居者互动态度消极,采取排斥甚至种族歧视政策,则已经决定放弃原有文化及认同的移居者很可能沦入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相反,如果主流社群强制推行同化政策,则即便移居者群体还对原居地文化抱有认同,都将被迫放弃。由此,再将作为少数族裔的移居者群体与主流社群的文化适应策略交互,并依据整个社会的权力格局加权,则会组合出更为丰富的文化适应类型。而文化适应理论以不排除“求同”的“存疑”形式修正并扩展了传统同化理论,也正好回应了甘斯推动不同阵营的移民研究者达成和解的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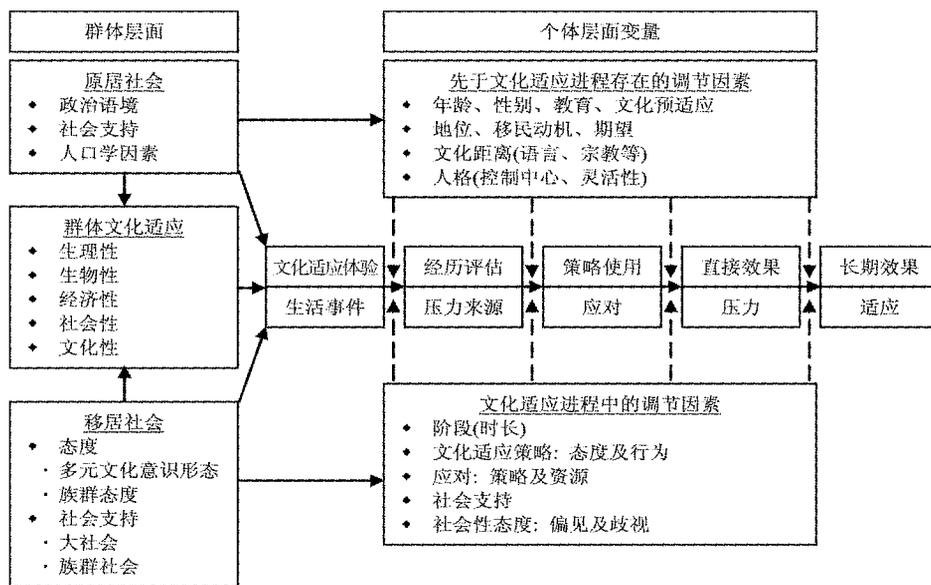


图2 文化适应研究框架(Berry, 1997)

当然,文化适应策略只是提供了两种文化在相互接触时双方成员行为策略的类型学。此外,国家的政策取向也将影响双方的策略选择,同时,某一社会往往会对某种策略有一定的倾向性,而个人在整个文化适应阶段,也可能作出不同的策略选择(Berry, 1997)。要充分理解影响双方决策选择的因素(陈慧等,2003)、双方对待彼此文化的态度何以形成,在文化适应策略之外,整个文化适应进程的运行又存在何种机制,则需要置入一个包罗更广的框架中加以讨论。为此,贝里(Berry, 1997)也提出了一个宏大的文化适应研究框架(见图2)。尽管任何一项有关移居者议题的研究都只能涉及其中的某些内容,但这一框架还是为研究者们实施经验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反思视角,以减小某些重要因素的缺漏给机制分析和因果推定造成的偏误。

作为文化适应的结果,移居者群体将发生态度转变(Berry, 2005),具体而言又包括文化脱落(cultural shedding)、文化学习和文化冲突三种类型,前两种类型主要是移居者使自身更适合(fit)迁入社会的主流文化。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也将给移居者群体带来不同程度的压力,较之采取边缘化策略的群体,寻求整合策略的群体受到的文化适应压力相对较小,而同化和隔离者则居中(Berry, 2005)。文化适应压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迁移者与主流文化间的文化冲突。不过由图2可见,文化适应进程的长期结果,也是文化适应理论的最终旨趣,在于长期的积极性适应,即为了响应外部环境需求,发生在个人或群体身上的相对稳定的变化(Berry, 1997, 2005)。选择任何一种文化适应策略都可能达成最终的适应,如前文提及的周敏(1995:19)在对唐人街的相关研究中,将唐人街称为“民族聚集地”,选择隔离策略的华裔移民得以充分利用原有的社会资本,熟悉而可信赖的环境,为需要在美国社会立足的移民的身体和心灵都提供了安全感。尽管仍缺乏完善的理论化,相关研究还是进一步将长期适应分为心理适应、社会文化适应和经济适应三类(Berry, 1997),心理适应即移民个体的一系列内在心理后果,包括一种清晰的个体和文化认同感、精神健康和在新语境下的个体满足感;而社会文化适应则指外在的心理后果,即在新情境中,特别是在家庭、工作和学校里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经济适应则是个体对于在新环境中获得的工作的满足感。

文化适应理论旨在应对移居者在新文化语境中的适应问题,所以在理论上能修正和扩展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同化理论,也可以使面临迁移的个体在两种或多种文化中取得更大的成功机会(Berry, 2005),同时能够为政策制定和制度选择提供参考(Berry, 1997, 2006: 39),从而建立起稳定的社会连带机制(Berry, 2011)。

四、文化适应理论框架的进一步完善:多元理论模型的整合尝试

(一)分段同化(Segmented Assimilation)模型

如前所述,周敏(1995:250)在对美国唐人街的相关研究中,已经初步质疑了同化理论,但还是认为通过民族聚集区的模式,选择隔离策略的华人在几代之后还是会走向彻底同化。她和波特斯(Portes)主张用“分段同化模型”来取代传统的同化理论(Zhou, 1997b)。具体而言,分段同化将导致移民及其子女在对迁入地的适应模式上形成三种类型:一是持续的向上流动模式(time-honored upward mobility pattern),移民将被平行整合进白人中产阶级,基本可以对应于文化适应策略中的同化类型;二是向下流动模式(downward-mobility pattern),即移民被同化进社会底层,陷入永久贫困,一定程度上对应于边缘化策略;而在第三种类型中,一部分移民在经济上取得突出成就,但仍然维持作为移民群体的社区组织和社会连带,整合与隔离策略虽然在移民与主流社群的互动形式上有所区别,但都可能处于与“分段同化模型”中第三类移民类似的境况。

从对“分段同化模型”进行系统性理论梳理(Zhou, 1997a; 1997b),到近期有关美国华人群体的研究(Zhou, 2009),周敏始终将重点放在未成年移居者及移居者后代(the Second Generation)适应移居社会的状况上。对他们而言,影响适应进程的外因包括种族分层、经济机会、空间隔离概况等,而在原居社会中的经济状况和人力资本、家庭结构、社区组织、社会关系的文化模式等则是内因(Zhou, 1997b)。作为移民的适应进程与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进程相互交织,可能会对未成年移居

者和移居者的后代产生比对移居者本人更深的影 响。贝里提出的文化适应进程主要是在一代人之 内展开,而对于未成年移居者和移居者后代而言,原居社会的影响、先于文化适应进程存在的调节 因素,都会有所改变。近期的文化适应研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关注文化适应与未成年移民及 其个体发展、学校教育等要素间的关系(见 Sam & Berry, 2006, 第 7、24、25 章)。

(二)叠合同(Adhesive Identities)模型

杨凤岗(2008:220)在有关移居美国的华人基督徒的宗教皈依和认同建构的民族志研究中,参考 学界对移民群体的既有研究,以及意图对同化理论和“民族性”加以调和的理论,提出了“叠合同”的 概念。事实上,任何宗教徒都兼备多元身份或者多元群体资格,他们有着自己鲜活而动态的“多元一 体”的生命追求(方文,2008b)。杨凤岗注意到,华盛顿地区的美国华人基督徒,具备华人、美国公民和 基督徒三重高度异质性,可能存在张力的认同。但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成员而言,既没有放弃原有族 群认同、被动地接受同化,亦没有拒绝融合而简单地固守其族群认同(即隔离策略),而是同时圆润地 建构和重构美国人认同、华人认同和宗教认同(杨凤岗,2008:233-234),即将基督徒、“有民族特征的 美国人”和 华人文化认同叠合在一起而未加偏废,整合成一种叠合同(杨凤岗,2008:220)。不过, 整合多元认同的努力不见得都能获得成功,在叠合同之外,还可能出现两类不尽成功的认同整合 模式:碎片整合(fragmentary integration),即某一种认同类型的特征更为突出,具体而言,既可能是高 度中国化的(类似文化适应的隔离策略),也可能作为移民后代在美国出生而是高度美国化的(同 化策略);融化整合(fusive integration),即三种认同混合而产生出新的特征,这样的人群无论在华人 社会还是美国主流社会,往往都可能被视为边缘人(杨凤岗,2008:222)。

叠合同模型被认为超越了移民研究的同化模式和多元主义模式,弥补了社会认同论和宗教 叙事论仅仅关注单一宗教认同的缺陷,具有深远的解释潜能(方文,2008b)。前文已经展示了多元 认同整合的几种类型与文化适应策略模型的高度契合,同时,融化整合模式也提供了理解移居者群 体被边缘化的新形式。另一方面,叠合同模型与前文提及的沃特斯和希门尼斯(Waters & Jiménez, 2005)有关同化进程新趋势的讨论类似,没有把原居社会的影响仅仅作为一种文化适应进 程的前置因素加以考虑,而是强调其在整个适应过程中都将产生持续影响。近期一些研究者基于 文化适应策略,利用在法国的罗马尼亚裔和摩洛哥裔族群的资料进行了量化分析(Badea et al., 2011),他们发现如果移民在完成迁移后仍感到来自原居国的拒斥,如原居国的亲友将他们的行动 视为背叛,则会对移民的原居国认同产生负面影响,使他们更倾向于采取同化策略;相反,如果这些 人受到来自法国人的拒斥,那么他们的法国认同水平便会显著下降,进而更倾向于采取隔离策略^①。 因此,原居国特别是移居者与仍留在原居国的亲友间的连带,会在整个涵化进程中对策略的选择和 文化适应进程产生持续性影响。

(三)文化动态建构模型

赵志裕和康莹仪(2011:320-327)在对禀赋多元文化心智的个体迁移过程中多元文化认同进 行研究时,借鉴了文化适应策略相关模型,同时基于他们提出的文化动态建构模型(Hong et al., 2000),总结了多元文化认同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一是多元文化认同的协调策略,具体而言又包括 整合(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认同融合为一种一致的认同)、转换(根据不同的文化认同在当前语境中的 适用性,在两种文化认同之间来回转换)和协同(一种新认同的形成,而这种认同不仅仅是它所包含的 几种认同的简单加总);二是文化认同的分隔,即身被多元文化的行动者感到几种文化是相互对立的, 从而将它们分隔开来;三是认同矛盾、边缘化和疏远,即移民管理自身文化认同的不同方式可能带来 内在认同冲突,或者因为生活经历的变化而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体验到认同矛盾。这一模型参考了贝

^①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对原居国与法国的认同,都不会显著影响到边缘化策略的选取。但对被原居国或法国 拒斥与边缘化策略采取的相关性检验则是显著的(Badea et al., 2011)。

里的相关研究,所以与文化适应策略模型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不过赵志裕和康莹仪(2011: 327)认为,这一模型意在表明认同转换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种种障碍,但这并不意味着迁移和认同转换必然导致负面后果;同时也应注意,当个体因接触增多而逐渐掌握自主调节技能时,“不同的认同管理策略便可能会在个体相对无意识的情况下被采用”。

文化动态建构模型的一个重要预设是行动者禀赋多元文化心智,这挑战了一部分文化适应理论家的预设,即他们关注的个体出生并成长于某种单一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具有一套自身的行为逻辑,而迁移则会使他们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发生接触(Sam & Berry, 2006: 3-4)。事实上,尤其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不同文化之间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交流,某种文化语境下成长起来的个体,也往往可能具备另一文化的某些突出特质。不过多元文化认同并不是全球同质化的认同模式,隶属不同群体的行动者在多元文化心智的发展水平方面必然有所区别,同时全球化并不是某个给定的宏观语境,而同样被动态地建构着。如果将文化适应策略模型应用到对全球化的理解(Berry, 2008),不难发现事实上全球化进程只是为不同文化提供了一种接触的可能性、一个文化适应进程的始点,一种由某些国家主导的“全球认同”当然是可能的,不过大量经验事实也为整合、隔离、边缘化等可能的文化适应策略提供了理据,全球化并不等同于全球同质化。

五、中国经验初探：转型心理学视野下国内移居者的文化适应

贝里(Berry, 2001)致力于建立某种“移民心理学”,即将一定程度上受到人类学影响的文化适应理论,与在社会心理学中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群际关系理论相结合,两条研究理路在议题和分析视角上已经达成了许多共识。不过无论是贝里意图建立的移民心理学,还是前文试图整合的移民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相关理论模型,都主要着眼于国际移民。从国际移民的角度而言,中国人口的主体由国内的世居人群构成,通常不会将中国范畴化为移民国家。而国内学者在引入族群概念时(马戎, 2004),也力倡以之替代现行的民族概念,对文化适应的研究也主要着眼于少数民族群体。

这种思路固然深具理论洞察和现实意义,但很早便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韩起澜(2004: 4)便基于中国的民族分布状况和主要居住特点,认为少数民族与汉族间关系“不是内陆省份和沿海省份族群概念的主要面……如果说在全中国族群式关系的发展取决于非汉族少数民族的存在,那就找不到什么族群,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族群”,她的研究力图揭示族群身份如何在汉族人群本身中得以建构,从而将原籍地的社会含义和社会建构引入了族群概念中。尽管中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移民国家^①,但长期以来一直有一定的国内人口流动,而国内不同的地域之间、城乡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文化差异,因而国内人口流动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后果,早已引起了广泛关注。仿照前文征引的多元社会人群的类型学讨论,我们也可以尝试从地域和城乡的维度对国内的迁移者群体进行分类[见表2(A)、2(B)]。需要说明的是,表2只是列出各类型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群,而不拟完备列举;同时,本地与外地的界分是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建构,在不同语境下其边界移动幅度很大,这里只是做了一种无差异的权宜界分。

表2 (A) 本地 - 本地移居者类型

		迁入地	
		城市	农村
原籍地	城市	搬迁; 拆迁安置	下乡知识青年
	农村	农转非; 进城务工; 入学	婚姻; 逃难; 拓荒

^① 不过近年来,也有数量较多的外国人因为各种原因在中国长期居住,如广州的黑人群体(参见李志刚等, 2009),亦开始引起学界日益浓厚的兴趣,其社会影响如何,这一现象又具备何种学术研究的潜力,或尚需持续关注。

表 2

(B) 本地 - 外地移居者类型

		迁入地	
		城市	农村
原籍地	城市	工作调动; 投亲; 入学	旅行
	农村	外来务工; 投亲; 入学	婚姻; 逃难; 拓荒

当然,表 2 所示每一种类型中的代表性人群,其规模大小存在着明显差异,受关注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在社会转型背景下,数量持续增长的进城务工者和外来务工者,被范畴化为“农民工”群体,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除了传统的劳资冲突视角以外,研究视角还包括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如李培林、李炜, 2007, 2010)、城市生活体验、社会认同等方面(参见方文, 2008a)。

事实上农民进入城市务工与中国都市化的整体进程一直相伴而行,清末至民国时期的上海,便是一个由包括进城务工农民在内的、多样化的移居者群体组成的移民社会(Wakeman & Yeh, 1992)。韩起澜(2004)对此际移居上海的苏北人群体的研究,便展现了“江北人”适应上海社会的艰难进程。最初是以逃难者身份进入上海的“江北人”,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江南人”群体在方言、习俗等方面差异显著,尤其经济地位与江南人相去悬殊,如果借鉴文化适应策略模型,进入上海主流社会无门反被污名化的苏北人群体,又缺乏以同乡纽带为基础的私交和组织关系(韩起澜, 2004: 67),甚至于他们的“江北人”身份只是某种偏见政治的产物而不是共享的认同,因此移居上海的苏北农民很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处境。

但边缘化并不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唯一可能的策略选项,项飙等(项飙, 2000; 王汉生等, 1997)对京南浙江村的研究,则呈现了农民进入城市的另一种可能路径。这些主要来自浙江温州地区的农民带着综合性资源来到北京,在流入的大城市中建立起一个基本属于自己的准社区,不仅聚居于此而且促成了一种新的产业组织形式的产生,与美国的唐人街非常相似(王汉生等, 1997)。一方面,他们已难以返回故土,甚至受到原籍地的排斥,但在观念上仍对家/家乡念念不忘(项飙, 2000: 223),并且保留着家乡的生活习惯;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直接与村外的北京社会接触,还屡屡受到各种政策性因素的排斥,同时他们在北京立足也主要利用原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连带,因而尽管他们可能将子女送到北京的学校,但并不代表他们认同北京文化(项飙, 2000: 254-255),会采取同化策略。在特定时代的政策环境下,可以将他们的文化适应方式视为具有高度内在活力的隔离策略。

将文化适应理论的相关研究框架引入对包括农民工群体在内的国内移居者群体(流动人口)的讨论,能够为更好地理解移居者在新社会语境中的适应过程提供简洁而又相对完善的理论工具。同时,国内的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尽管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但也具备许多高度共享的文化特征,使得较之国际移居者群体而言,国内移居者更容易获取多元群体资格,在多元文化心智之间转换也更为灵活,又能转而进一步深化文化适应理论的讨论框架。同时,前文对文化适应理论和移民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相关理论模型的整合尝试,包括文化适应进程中的代际差异、原居地对移居者的持续影响等因素,在国内移居者研究的应用方面,如考察外来务工者子女的都市适应等议题,也将有所助益。

前文已经对国内移居者群体做了一个大致的类型区分,尽管进城务工者和外来务工者可能构成国内移居者的主体,我们也应对其他群体的文化适应进程投以更多关注。例如搬迁同样可能对移居者造成巨大的文化适应压力,埃利亚斯等(Elias & Scotson, 1994)的一项经验研究就表明,偏见和歧视可能在完全没有族群和社会地位差异的人群之间形成,只是因为一些住户比另一些新近迁入的在当地居住的时间更长,在他们中形成了某种连带机制。再例如在韩起澜(2004)和顾德曼(Bryna Goodman, 2004)的上海研究中,在上海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江南人”,特别是江浙富商,事实上也是移民,尽管他们视上海为旅居之地,但仍竭力要僭取本地人的地位(韩起澜, 2004: 38),他们依靠“乡情、乡谊和梓谊”等同乡情感及原有的人际关系网络,在上海建立起了保障自己的身份

地位得以维持的新社会关系(顾德曼, 2004: 1),使得上海的主流文化被厚厚地涂上了江南底色。所以,移居者群体本身的多样性、移居者与迁入地主流社会力量对比的多样性,使得移居者的文化适应过程得以展现出丰富的面向。

六、结语

前文提到,贝里(Berry, 2001)致力于统合文化适应理论与群际关系理论,从而建立起一种统一的“移民社会学”。就国内移居者而言,无论是移居者群体还是迁入地的主流社群,其中个体会因为迁移活动而获得更为多元的群体资格。群体资格是转型心理学的核心构念,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每个个体作为能动行动者,通过终身不懈的认同努力,都在缔造自身独特的‘多元一体’的完整生命;‘多元’是指每个行动者身上的多元群体资格;这些多元的群体资格又以行动者的肉身(及其延伸)作为具体表征,成就其独特的完整生命”(方文, 2008a)。迁移者选择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正是其试图调和移居者作为一个居处于此时此地的个体,与其彼时彼地的文化背景这双重(甚或多重)群体成员资格,在原居地文化与迁入地主流文化、本身作为移居者与迁入地主流社群等要素的交互作用下,寻求达成积极性长期适应的不懈努力。类似机制,也同样会在迁入地主流社群身上发挥作用。

文化适应理论既包括群体层面的态度选择,也包括迁移者个体、迁入地主流社群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相对微观的心理机制和行为策略。进一步融合文化适应与群际关系理论,并用以直面中国社会转型语境下国内移居者群体本身及为迁入地带来的影响,或可为转型心理学回应整个中国社会转型过程,描述、理解和解释社会转型中中国人心理和行为逻辑的理论雄心,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 陈慧、车宏生、朱敏, 2003,《跨文化适应影响因素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第6期。
- 方文, 2008a,《转型心理学:以群体资格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 2008b,《叠合认同:“多元一体”的生命逻辑——读杨凤岗〈皈依、同化和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社会学研究》第6期。
- 顾德曼, 2004,《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 1853-1937》,宋钻友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哈维·大卫, 2004,《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韩起澜, 2004,《苏北人在上海, 1850-1980》,卢明华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
- 李培林、李炜, 2007,《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社会学研究》第3期。
- , 2010,《近年来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李志刚、薛德升、杜枫、朱颖, 2009,《全球化下“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例》,《地理研究》第4期。
- 马戎, 2004,《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 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项飏, 1997,《“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社会学研究》第1期。
- 项飏, 2000,《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杨凤岗, 2008,《皈依·同化·叠合身份认同》,默言译,北京:民族出版社。
- 余伟、郑钢, 2005,《跨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适应研究》,《心理科学进展》第6期。
- 赵志裕、康莹仪, 2011,《文化社会心理学》,刘爽译、方文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周敏, 1995,《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鲍霭斌译,叶振猷校,北京:商务印书馆。
- Alba, R. & V. Nee 1997, “Rethinking Assimilation Theory for a New Era of Immigration”,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1 (4).
- Badea, C., J. Jetten, A. Iyer & A. Er-Rafiy 2011, “Negotiating Dual Identities: The Impact of Group-based Rejection on Identification and Accultu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41.
- Berry, J. 1990, “Psychology of acculturation”, in J. Berman (E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Vol. 37.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 1997,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46(1).

- 2001, “A Psychology of Immigra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 57(3).
- 2005, “Acculturation: Living successfully in two cultu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Vol. 29.
- 2006, “Contexts of acculturation”, In D. Sam & J. Berry (eds.) .
- 2008, “Globalization and accultu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Vol. 32.
- 2009, “A critique of critical accultu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Vol. 33.
- 2011, “Inte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Ways towards Social Solidarity”, *Papers on Social Representations*. Vol. 20.
- Berry, J. , Y. Poortinga, S. Breugelmans, A. Chasiotis & D. Sam 2011, *Cross – Cultur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3rd Edition)*. Cambridge, U. 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ias, N. & J. Scotson 1994, *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 A Sociological Enquiry into Community Problems*. London: Sage.
- Gans , H. 1997, “Toward a Reconciliation of ‘Assimilation’ and ‘Pluralism’ : *The Interplay of Acculturation and Ethnic Reten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1(4).
- Gordon, M. M.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ng , Y. - y. , M. W. Morris, C. - y. Chiu, & V. Benet - Martinez 2000, “Multicultural minds: A 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culture and cogni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55(7).
- Oishi, S. & J. Kissing 2009, “The Mutual Constitution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Individualism”, in R. S. Wyer, C. - y. Chiu, & Y. - y. Hong (eds.) , *Understanding Culture: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Olneck, M. 2006, “Assimilation and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In R. Ueda (ed.) , *A companion to American immigration*. Malden, MA : Blackwell Publisher.
- Oudenhoven, J. 2006, “Immigrants”. In D. Sam & J. Berry (eds.) .
- Rumbaut, R. 1997, “Assimil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Between Rhetoric and Reality”,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1(4).
- Sam, D. & J. Berry (ed.) 2006,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Acculturation Psychology*. Cambridge, U. 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keman, F. & W. Yeh (eds.) 1992, *Shanghai sojourners*.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Water, M. & T. Jiménez 2005, “Assessing Immigrant Assimilation: New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Challeng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31.
- Zhou , M. 1997a, “Growing Up American: The Challenge Confronting Immigrant Children and Children of Immigra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3.
- 1997b, “Segmented Assimilation: Issues, Controversies, and Recent Research on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1(4).
- 2009,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吕 鹏